

专题文稿·转型反思

1989-2029 年大转型 ——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阐释，考察了其历史特性，批驳了该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论点，而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强调，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市场改革与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在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同时不是将制度转型当作是自我实现的目标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才会取得更好的转型绩效，否则会朝相反方向发展。

【关键词】大转型 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 现实社会主义 新兴市场

【中图分类号】F13/17.5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3-0014-(15)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postsocialist system transformation)这么巨大的变化，尚不多见。这个转型发生在1989年到今天的这段时间内。有人认为10个中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已经属于欧盟的一部分，转型已经成功，其理由是该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但也有人认为，该地区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人赞同后一种看法。尽管根据1992年确定的哥本哈根标准，成为欧盟正式成

*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转型、一体化与全球化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员国的事实本身就表明，新成员国是“发挥功效的市场经济体”，有能力在欧洲一体化内部进行竞争，但这并不能确定制度的真正成熟与否。有关成熟的唯一合理标准是广义的市场文化的质变和制度的可靠性，即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可信性。这些要素能够确保机制的有效运作、创造和分配资本以及划分产出。在讨论机制的有效运作时，人们需要记住经济过程的能动性和平衡性。因此，为了达到这个意义上的市场制度和文化的状态，未来许多年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后苏联的中亚地区，如果将一般性的转型过程忽略不计，这些国家甚至不能称为后社会主义国家，最多只能称为实行制度变革的国家。毫无疑问，1989年时的匈牙利、波兰或南斯拉夫，毕竟要比20年之后的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更加市场化和自由化。不过，由于时代背景的缘故，没有人在当时会将前者称为“转型经济体”，现在也没有人会称后者为“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体”。

一、瀑布

1989年春天，波兰具有历史意义的圆桌会议辩论达成了妥协性协议。参加圆桌会议的，有当时政权的代表和反对派代表，包括知识分子、商界人士、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这个协议成为制度大转型的催化剂，大转型涵盖了世界广大地区，起初是东欧，很快扩展到前苏联地区。其推动力对中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特别是越南的市场化和结构、制度转型，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从易北河到太平洋的三十多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市场经济和民主转型之路。其人口超过18亿，高于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新阶段以及剧烈的文化和政治变革背景下，经过20年的转型，这个进程不仅使世界这个部分焕然一新，而且甚至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事实上，1989年对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而言，从南美洲和中美洲经过非洲和中东到南亚和东亚，同样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头。其中，智利和尼加拉瓜、加纳和南非、也门和叙利亚、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较为突出。

1989年的转向(turnaround)更为剧烈（更为剧烈的原因是，转向的许多因素在这之前已经接连出现，在不同程度上为特定国家的转型做了准备）^①，同时是指冷战的

^① Bąk, Monika, *Europa Środkowa i Wschodnia wobec wyzwania transformacyjnego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s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Gdańsk: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Gdańskiego, 2006.; Koźmiński, Andrzej K., "How It All Happened",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Warszawa: Difin, 2008.

结束。结果，冷战双方的冲突，即第一世界（由美国领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前殖民地宗主国）与第二世界（由苏联和中国领导的国家）在第三世界领土上的冲突，也宣告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 20 年之后的影响更大，而且在按不同方式划分的世界某些部分的影响首屈一指，并仍在继续增强……。

造成文化、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环境转型瀑布效应的原因，是一系列积累而成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现实社会主义”模式(real socialism)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后社会主义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的扩展、后殖民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的“出现”、现阶段全球化、信息革命、大规模移民浪潮的高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等等。

确实，我们必须始终应对正在出现的连续性和变革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然而，在某些时候，积聚的变革会同时发生，引发别具一格的“瀑布”。不过，历史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状况。局势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在于其同时发生的特性。变革的瀑布汹涌澎湃，冲击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体，造成与自然、文化和技术的碰撞，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构造上的变动。一种新的特性应运而生，可以在共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解释^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对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进程的历史特性进行考察。

二、判 定

假如我们向人们提问，包括向杰出的经济学家（指那些精通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了解 1989 年以来后社会主义国家实情的经济学家）提问：在转型开始 20 年之后（不含中国和印度支那，其发展十分独特），平均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如何？我们会发现，得到的回答中没有一个仅仅是高出 20%。如果只是谈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指数在二十年之后提高了 120%，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所谓的巨大变革就显得毫无意义。为何变革制度的目的只是为了判定下一代（4 亿人）患上佝偻病，甚至只是实现年平均增长率 0.9%？然而，这就是所做的一切……。

20 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预测（此举看上去荒唐可笑）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不是五分之一而是 5 倍。在这段时间里，这个仍然被某些人视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国，将生产水平提高了 420%。中国通过走自己的道路和不理睬西方的压力和“忠告”，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这与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某些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压力和“忠告”。中国完美地实现了市场看不

^① Kolodko, Grzegorz W., *World on the Move*, New York (forthcom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见的手与国家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合作。在中国温和地从改革计划经济过渡到逐渐创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两种对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之间的良好合作，决定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成功。尽管中国仍然不承认这一点，现在正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仍在弘扬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中国已经踏上了建立市场经济的道路，具有长期的涵义。

对于反事实或他择性的历史问题：假如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假如中国选择了叶利钦统治时代俄罗斯式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或比 1989 年更低的生活水平，同时使得数千万悲惨的移民充斥于世界各地呢？

假如由波兰为先导的东欧国家，然后是苏联，没有出现进行复杂和深刻制度变革的政治条件，假如这些国家走上了与中国和印度支那国家相似的渐进和有效的市场改革道路，而不是实行后社会主义的急速转型的话，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作出推测：情况会更好些，1990-2009 年的增长速度也会比可怜的年平均增长 0.9% 要快很多。事实上，这个增长速度与之前的 20 年，即 1970-1989 年相当，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与更早的 20 年——1950-1969 年相当。

但也有观点认为，由于 80 年代与 90 年代之交的危机和莽撞地实行快速和平衡的增长方式，这些国家会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生产水平也许会更低。但是，考虑到 80 年代末进行的市场改革，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进行的这类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第一个选项更有可能：一个比实际增长率更高的增长速度。

毫无疑问，在进行更深刻改革的社会主义现实中，不论形式如何，再分配机制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收入不平等的差距肯定会比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时期更为悬殊，但要比实际情况小一些^①。但是，这个假定也可以受到质疑，比如中国和越南的案例就不能证明这一点。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迅疾改革，造成了不平等程度的逐渐加大，甚至超过了那些实行渐进转型的国家的贫富差距。表明收入差距水平的基尼指数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的基尼指数是 0.47（2007 年），越南为 0.37（2004 年），而波兰为 0.35（2005 年），匈牙利只有 0.28（2005 年）^②。

^① Kolodko, Grzegorz W.,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omkiewicz, Jacek, “Nierówności dochodowe w krajach posocjalistycznych – mechanizmy i uwarunkowania na tle tendencji światowych” (“Income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s Against the World Tendencies”), *Problemy Zarządzania*, 2007, No. 3, pp. 121-135.

^② 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8”, 2009(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三、改革与转型

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市场改革与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对于前者，所做的一切是改变现存制度的运作方式，目的是保持这个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革者就要使制度更有弹性，增强应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技术条件的能力。为此，需要提高公司效率和赢得社会支持，或至少是要使社会能够接纳制度功能。因此，在改革方面，尽管变革时常具有深刻和超前的特性，但其目的是维护现存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要否定它们。这就是苏联在 80 年代末改革的目的，是波兰在同一个 10 年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匈牙利于 1968 年启动的转型的含义，也是南斯拉夫在 50 年代开始的不同形式的自治社会主义的基础。

至于第二个选项，即后社会主义转型，其目的是废止先前的制度，通过大规模实质性的重建，由新制度（事实上就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地区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汇，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本身。尽管像“市场经济”这样的委婉语用得更为频繁，但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存在着（虚构的）弊端的前“共产主义”与存在着（假定的）优点的“市场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仅是命运使然。这种在并不存在的色彩黯淡的“共产主义”和理想化的、同样也不存在的“市场经济”之间的故意对比（出于意识形态动机，无实际意义但在政治上有用处），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因此混乱不堪，漏洞百出。而适当的对比则必然与现实发生冲突，即以前的现实与现在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指被贬损的过去形象与被美化的现在形象，或现在与虚构的未来之间的冲突。

因此，所谓的事实上的现实社会主义，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与所谓的真正的当代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应当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对比^①。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没有准备好作如此客观和广泛的比较。我们必须等待，也许要等 20 年甚至更长时间……。

四、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这个术语得到普遍的使用（也误用于指后社会主义的现实，却没有进行必要的思考），但它不是用来描述制度转型下国家复杂的经济新现实。该术语

^① Główny, Jan, *Szalbierczy urok transformacji (The Cheating Charm of Transformation)*, Warszawa: Fundacja Innowacja, Wyższa Szkoła Społeczno-Ekonomiczna, 2003.

属于又一个新自由主义概念。它与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扩张相关联，其延续的时间与长达 20 年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相同^①。不过，这些“新兴市场”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促使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的进化和成熟。正在出现的是世界上富裕国家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投机行为。这些活动早就“出现了”，而且已经在制度上和金融上成熟，因此这些强大和富裕的国家打算在传统的支配范围之外运用其财富力量。请参阅 1989 年之前世界分野状况的地图，当时非市场化地区的形势驱使它向资本打开大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才行。

按照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新兴市场”被作为一种工具、作为更多的商机来对待，而没有考虑到实行市场化地区的社会成本。但按照那些对“出现”感兴趣的国家和经济体的观点，其目的完全不同：卓有效率、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将能够以理想的方式满足其自身社会的需要。

简言之，在有关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的新自由主义路径与社会市场经济路径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前者集中于正在出现的营商环境之上。人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而是有必要加以了解，作出恰当的反应。后者集中于创造和发展基于新的市场管理原则的新型社会契约。所以，所出现的不仅仅是“市场”，而且还包括基于社会的市场经济。这是很不相同的……。

因此，西方对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进步、发展和财富所表达的关切，主要是一种文字游戏，是一种对自己利益的关切。在利益当中，西方关切的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利益，尤其是富裕国家金融精英的利益。我们不应对这一现实感到忿忿不平，因为这只是极为天真的反应而已。我们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进行调整，因为新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即由自由化的推进和市场的一体化所产生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不仅会产生新的危险和风险，而且甚至会产生更多的新机会。然而，其益处将在长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体现，所以在精确的经济理论上确定发展目标，进而形成有效的战略，十分必要。

至于上文提及的历史判定，考虑到整个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环。但其规模还需要从政治和**严格的**科学方面作严肃的思考和辩论以及可靠的评估。

二十多年以前，“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经济运作的环境是缺乏政治民主，以国家对财产的支配权、中央分配资本和官僚控制为基础——正在走向终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原因在于这种制度的发展能力已经消耗殆尽。人们对其发挥的所

^① 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有三个方面的社会功能，越来越表示不满^①：

- 生产者：由于错误的生产组织未能带来所期望的效果，而越来越感到失望
- 消费者：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短缺和短缺—物价稳定综合症^②，消费者的满意度较低（在生产增长的背景下）。有时处于绝对的低水平上，因为不仅挣钱困难，而且花钱也不容易。
- 公民：所谓的人民民主和或多或少自由化的政党制度远远没有为人们提供有组织的、创造性的表达意见和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制度产生的问题要多于能够解决的问题。“物质疲劳”（“material fatigue”）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制度本身在自身功能失效的重压之下必然崩溃。

这一切都发生在 1989 年及此后的数年里，当然本可以发生在数年或十几年之前或之后。但是，这一切必然发生。首先，在持续加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团结工会”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自相矛盾，转变为大众的或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波兰的例证最为明显）^③。同样在波兰，主张改革的政府最早了解其含义，决定与圆桌会议分享权力。罗马尼亚的变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其他国家的过程采取了以上两个极端例子之间的方式。

显然，外部压力发挥了作用，但起作用的主要是内部进程，对外部压力不可估计过高。外部压力利用了内部的瓦解进程，而不是下达指令或确定变革的步调。即使在美国，当政的民主党采取和解和合作的态度，对制度改革释放善意，寄希望于“人道的社会主义”，与持对抗态度的共和党不同。英国则是工党执政，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第三条道路”，与对东方抱有敌意的保守党不同。但无论如何，“现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假如这一切没有在 80 年代末发生，也将会在不久之后发生。不过，在这之后 20 年里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必然性，而且仍然在此过程之中。

五、事实、解释与推论

过去涉及到事实及其解释，而未来除了至关重要的主动掌控之外，还涉及推论和解释。前者较为困难，后者则更具吸引力，因为未来与事实无关，但将会提供事

① Kolodko, Grzegorz W., *Cele rozwoju a makroproporcje gospodarcze (Development Goals and Macroeconomic Relations)*, SGPiS, Warszawa, 1984 (Second edition, PWN Warszawa 1986).

② Kolodko, Grzegorz W. and Walter McMahon, “Stagflation and Shortagefl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yklos*, Vol. 40, Fasc. 2, 1987, pp. 176-198.

③ Ost, David,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NY., 2005.

实。至于会提供何种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上和实践上刻意作出的思想和政治假设及其后果。因此，对于未来的推测性思考，尽管存在某些思想和形式上的局限性，但仍然十分有趣，具有创造性和丰富性。那些不作推论者，不会预测未来。而没有预测，就不可能参与创造未来。

对于此前的后社会主义转型过程的估价仍然存有争议，而且如果不是永远争议下去的话，也会争议很长时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某些领域的理论概括已经完成^①。同时，虽然有时在有关经济增长路径的问题上存有严重的争议，但所有人似乎都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本应当更快些。毫无疑问，在转型以后的 20 年，其经济增长的速度本可以大大加快，其社会成本（失业、不平等、排斥边际margin of exclusion、贫困和过高的死亡率等等）本可以大大降低。相似的情形将会在未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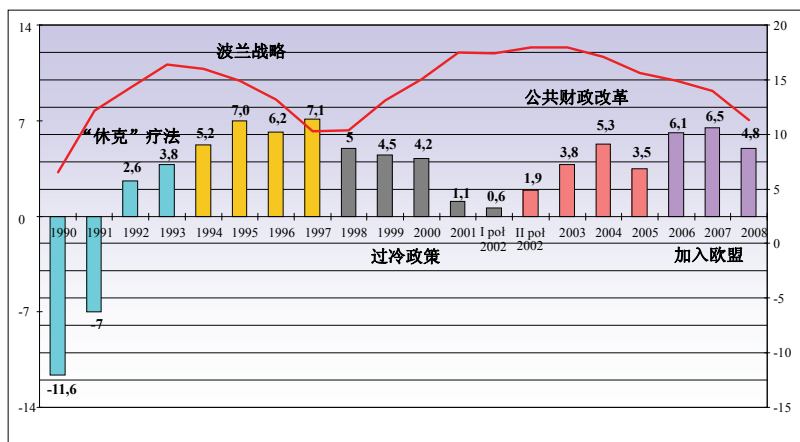
新自由主义旨在提供错误的转型路径（人们对此无法作出选择）。面对其刻意宣传以及根据以往情况展示的形象，人们很少尝试对 1990-2009 年的经济增长作出评估。显然，即使是参考了对生产和消费增长所作评估的精确结果，也不足以用来评估目前的情况，因为所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类别并不能覆盖社会经济状况的所有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虽然不够完美，但实用性更好。但这个指数也没有考虑到自然环境或闲暇时间及其使用的问题。在考虑到时间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文化价值观、对于现存权力运作方式和经济功能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综合的关注，比如综合幸福指数(Integrated Well-Being Index)^②。

我们以波兰（欧盟新成员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为例，该国 200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 1989 年的约 180%。除了中国和越南之外，这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不含土库曼斯坦，该国情况特殊，由于近年来能源价格的猛涨而增速加快，增长率达到 220%）^③。必须指出，波兰 80% 的增长，主要发生在 1994-1997 年和 2002 年第二季度—2008 年中的快速增长时期。而在 1990-1993 年和 1998-2001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接近于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势头和生产水平的变化与就业率和失业率密切相关。（图一）

① Blanchard, Olivier, *The Economics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saba, Laszlo,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Emerging Europe*,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2007.

② Kolodko, Grzegorz W, *World on the Move*, New York (forthcom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8. Growth in Transition*,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资料来源：中央数据局(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华沙（所涉不同年份）。

图一：1990-2008 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左侧刻度）与失业率（右侧刻度）
（从无治疗的休克到无休克的治疗）

有人试图评估波兰在过去 20 年中假定的增长速度。评估的基础是将 1990-199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值与政府的原始计划（1990 年下降 3.1%，然后出现增长）挂钩；将 1998—2001 的增长比照 1994—1997 年的实际增长速度，同时参照政府计划^①。这样做具有可能性。兑现这样的预设情况，只需要避免明显的错误：其一，上一个 10 年开始时破坏稳定的政策；其二，那个 10 年末不必要的冷却经济政策，当时的增长速度从达到最高值（指转型时期）的 7%（1997 年）下降到处于停滞的 0.2%（2001 年底）^②。

假如经济增长按照基于合理的建立市场制度政策和负责任的经济发展的预设情况发生，假如我们更加有效地应对 2008-2009 年的经济危机和保持约 4-5%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势头，那么 200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就不会是 20 年前的 180%，而是要高一半，即相当于当时的 280%。（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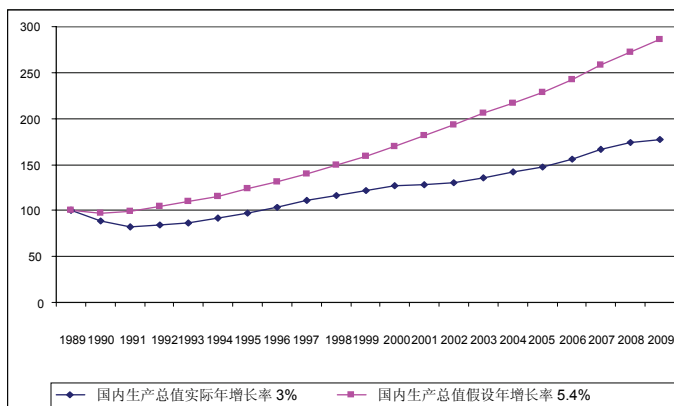
根据绝对价值，人均产值就不是与拉脱维亚相当的 18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而是超过 28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高于葡萄牙。这表明了未能利用增长潜力的程度和不可挽回损失的数额。在可获得收入方面的失败及其造成的影响，是某些时期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产生的后果。

至于其他转型国家，总体上到 2007 年才恢复到 1989 年的水平，出现错误的程度甚至要高于波兰，因此，未能利用增长潜力的情况也比波兰严重。其原因各不相

① Kolodko, Grzegorz W, "A Two-thirds Rate of Success. Polish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89-2008", 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9/14 (March), 2009.

② 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8. Growth in Transition*,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同，但通常政治方面的原因多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事实上，无休无止的政治争论有时转为民众运动，有时趋于新自由主义，导致无法实施保持理性和符合实际的经济平衡增长政策。



资料来源：中央数据局(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华沙（所涉不同年份）。2009 年的水平为作者的预测，假设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作者的计算结果。请见本文文字解释。

图二：1990-2009 年波兰事实的与假设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1989 年=100）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波兰保持 3% 的年增长率并不是不可避免之事，而 5% 的年增长率也不是不可实现的目标。

同样，转型国家也不是必然会陷入 0.9% 的缓慢年增长率。在对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和狭义上的经济政策必不可少的结构变革和新制度建设方面，这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目前造成的损害有：公司相对较低的竞争力、较低的生活水平、过高的外债和对外来资本和政治的依赖。

我们在未来会被迫付出类似的代价吗？我们希望不会这样，但我们看到对自己错误的认知是如此缓慢，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把握。所能观察到的惯性作用，有一部分是来自后社会主义构建所依赖的低效原则，一部分是来自为确保特定利益而进行国内外游说所造成的压力。

2008 年，欧盟 10 个后社会主义成员国的人口为 1.03 亿，占世界人口的 1.53%。这些国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1.86 万亿美元(购买力平价)，占世界总产值(GWP)的 2.6% 和欧盟总产值的 12.4%。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比例相对而言要低于（而不是高于）20 年之前。其原因在于，在 1990-2009 年这个时期内，无论是世界整体还是富裕国家（包括欧盟的西部地区）的产值增长率，都比后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许多。

而在未来的 20 年（2010-2029），情况有可能、也应该有所不同。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即使是在目前的 10 年（直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也表现出比高度发达国

家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的制度改良、技术进步、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和管理技能的改善，导致了比西方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由于微观经济管理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个趋势在未来应当会保持下去。显然，微观经济本身的变革还不够，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可或缺。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和持续，2009年和接下来的几年都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①。不可否认的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合理预测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势头绝非易事。但是，对于制度变革的长时段分析表明：考虑到全球政治、制度、文化、人口和技术各个方面，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在长时期内将会比欧盟的“老”成员国保持更快的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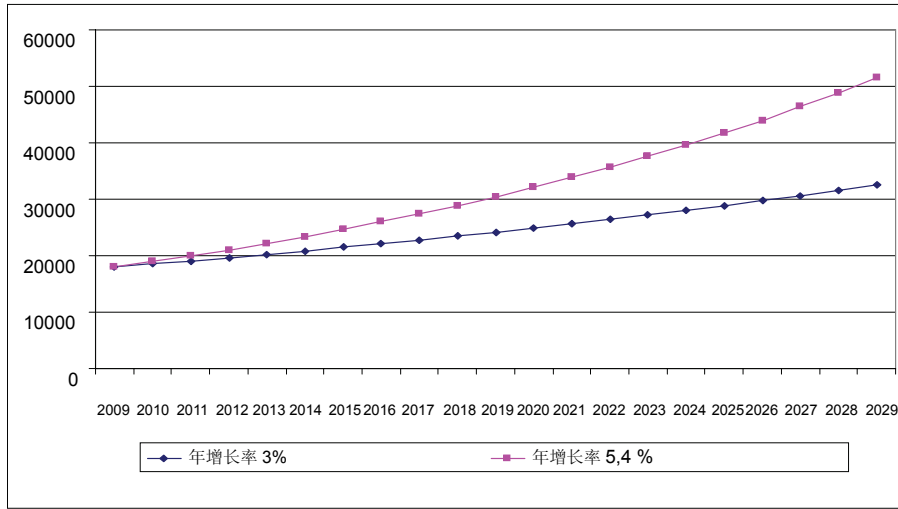
在长期的消除发展方面的历史差异时，每一个百分点都十分重要，因为时间和复利都在起作用。不过，促进快速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必须付诸实施。其基础必须是新实用主义^②，以及遏止民众运动的威胁和新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上的偏差。以上威胁和偏差的合流仍不时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对于经济平衡和增长势头尤为有害。

六、未 来

展望未来之时，我们再次考察波兰的例子。现在就如同1989年及此后几年一样，我们又面临着选择不同经济增长路径的机会。我们再次观察一下，可以看到这些路径处于很高的约年均5%的增长率（并非不可能达到）和较低的约3%的年增长率之间。之所以认为后者较低，是考虑到了可能性，特别是雄心壮志的要求。让我们审视未来2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的平均值在3%与5.4%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前者是1990-2009年的实际年增长率，后者是假如同时期避免了经济政策错误，特别是在前一个10年开始时实施的无治疗的休克政策和那个10年结束时实施的不必要的冷却和过度杀伤政策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的年增长率。在特定情况下，未来20年里5%的年增长率是有可能达到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将长期战略建立在适度的经济政策之上。（图三）

① Orłowski, Witold M, *Świat, który oszalał, czyli poradnik na ciekawe czasy (World Going Mad, or a Guidelines for Interesting Times)*, Warszawa: Agora, 2008.

② Kolodko, Grzegorz W, *World on the Move*, New York (forthcom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结果。请见本文文字解释。

图三：2009-2029 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不同曲线
(2009年 GDP=18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

在未来 20 年，如果欧盟所有 10 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年增长率都达到较快的 5.4%，那么 202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达到 5.33 万亿美元，几乎是目前的 3 倍。假定同期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约为 3.5%（那么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只有 2.5%），欧盟的 15 个“老”成员国的年增长率不超过 1.5%，那么在 20 年之后，前面 10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将从目前占欧盟的 12.4%和占世界的 2.6%，分别增加到约 30%和 3.8%。这将大大增强东欧地区的相对地位，尤其是在欧洲的地位。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到 2029 年，其余 10 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已经加入欧盟，其中包括：所有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科索沃、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和一些后苏联共和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2008 年，这 10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 7290 亿美元（购买力平价），乌克兰占其中一半，约 3600 亿美元。这 10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分别等于已加入欧盟 10 国、整个欧盟和世界产值的 39.2%、4.9%和 1%。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7 个巴尔干国家和 3 个前苏联共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只比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高一点（按购买力平价分别为 7290 亿美元和 6850 亿美元）。（表一）

表一 2008 年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

国 家	人 口 (百万)	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购买力平价)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购买力平价)
保加利亚	7.3	95.9	13200
捷克共和国	10.2	273.7	26800
爱沙尼亚	1.3	28.6	21900
匈牙利	9.9	205.7	20500
拉脱维亚	2.2	41.6	17800
立陶宛	3.6	65.8	18400
波兰	38.5	684.5	17800
罗马尼亚	22.2	278.4	12500
斯洛伐克	5.5	123.1	22600
斯洛文尼亚	2.0	61.8	30800
以上 10 国	103	1859	18100
阿尔巴尼亚	3.6	23.1	6400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4.6	30.5	6600
克罗地亚	4.5	73.4	16900
科索沃	2.1	5.0	2300
马其顿	2.1	19.0	9200
黑山	0.7	7.2	10600
塞尔维亚	10.2	83.1	8200
白俄罗斯	9.7	116.7	12000
摩尔多瓦	4.3	10.8	2500
乌克兰	46.0	359.9	6900
以上 10 国	87.7	728.6	8300
以上 20 国	190	2588	13600
欧盟 27 国	491	14960	34000
世界	6707	70650	10500

资料来源：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8”, 2009 (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仍在欧盟以外的后社会主义经济体，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其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这样，关于这些国家到 2029 年增长三倍的预估（达到 2 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应当是符合实际的。而欧洲 20 个后社会主义国家（10 个国家已经加入欧盟，另外 10 个国家应当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入盟）将会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5.3%。那时的世界人口将会在 80 亿左右，东欧则会大体上保持不变，即 1.9 亿-2 亿。因此，占世界人口四十分之一，即 2.5% 的东欧地区，将会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目前，这个地区占世界人

口的 2.84%，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约 3.7%。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根据年增长率 5.4% 的乐观预期，10 个已入盟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加 34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从目前的 18000 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52000 美元），这意味着人均近 190% 的增长，其前提条件是居民人口保持不变。随着产值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当然是件好事。这是后社会主义的制度转型应当达到的目标，绝不要像时而发生的那样，将行为方式与目标相混淆。

七、结 语

总之，对于这样问题：本可以更好吗？将会更好吗？答案显而易见：对于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于特定个人和社会集团在不同范畴内，当然是本可以更好。其前提条件是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同时不是将制度转型当作自我实现的目标，而是当作取得更高目标的工具。这个更高目标指的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并能够弥补历史造成的落后^①。

将会更好吗？就绝对意义而言，当然是这样。在未来 20 年的转型之后，生产和消费水平将会翻番，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增加三倍。欧盟后社会主义新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20 年之后会达到 50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吗？对于欧洲这个地区的 1 亿人口来说，可能性不大。但某些能够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按地区、而不是按国家来考虑问题）来说，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实现了这个目标的地方，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高于欧盟 15 个“老”成员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当然，后者将会继续发展，将生产和消费增加至少三分之一，但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不过，即使在 20 年之后，许多方面的差距仍然会明显存在，仍然会导致社会紧张状态和政治问题。

但是，情况也许不会更好，因为主观看法并不取决于对于过去和现在差别的确定，也不取决于与世界上富裕社会和国家差距的缩小，而完全取决于人们对个人、团体、社会和国家状况的自我评价，所考虑的相关问题包括人们的愿望、期望和主张。无疑，这一切都会高于实现的机会和实际实现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这些愿望、期望和主张将是进一步变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它们将是导致无休止沮丧的原因。

考虑到未来在这些领域中的增长势头和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情况仍然会比就

^① Kolodko, Grzegorz W., *Globalization and Catching-up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Rochester, NY and Woodbridge, Suffolk, U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能达到的更差。与以往一样，潜力不会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与过去 20 年相同。在经济政策上，由于不能妥善处理集团利益冲突，未来这个时期肯定会错误百出。究其深层原因，一是不够精确的理论评估所致；二是理论落在现实和没完没了的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将总体发展目标具体化和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分项目标。情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会如此。

对于过去 20 年以及之前年代的归纳总结，应当有助于缩小未来 20 年，即 2010-2029 年的潜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即使到 2029 年，仍然会有人像在 1989 年和 2009 年那样提问：“何时最终会更好？”带有讥讽口吻的回答将会是这样：“已然是……。”

（潘兴明 译，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t-socialist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since 1989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t examines it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iticizes the views that this region has institutionally matured to a full-blooded market economy. Instead,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post-socialist market transformation won't develop perpendicularly.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market reforms of a real socialism economy and a post-socialist market transform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results w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various countries to various extents if the objectives had been more accurately determined and the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had been treated not as a self-contained aim but as an instrument to achieve the superior aim.

【Key Words】 Great Transformation, Post-socialist System Transformation, Real Socialism, Emerging Market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еликий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пос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еаль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формирующийся рынок

（责任编辑 常喆）